

深圳大学
中国文化与传播系
主编

文化与传播

(第三辑)

海天出版社

文化与传播

(第三辑)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系 主编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方映灵

封面设计 陈士修

责任技编 卢志贵 李镜明

文化与传播 (第三辑)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系 主编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金潮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 字数330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615-155-9

G·38 定价: 24.80 元

学术顾问 张岱年 季羨林 汤一介 李学勤 蔡德麟
胡经之 许宗衡 李 青

主 编 章必功

副 主 编 郁龙余 景海峰 吴俊忠 熊源伟

编 委 陈乃刚 封祖盛 傅腾霄 郭纪金 林 岗
钱学烈 朱艳霞 吴予敏 刘丽川 马家楠
张卫东 王丽杰 宋 城 方映灵

目录

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	[美]杜维明(1)
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	[台湾]李亦园(40)
古代山水诗的三种境界·····	熊礼汇(58)
论黄遵宪的山水旅游诗·····	臧 晟 武道房(79)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建设·····	陶 蒂(106)
旅游点形象定位初探·····	李蕾蕾(118)
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契机·····	[香港]刘述先(125)
当代新儒学与新儒家的自我超越：一个致广大与尽精微的追求· ·····	[美]成中英(140)
再论政治儒学·····	蒋 庆(154)
梁漱溟早期思想论略 ——以佛学研究为中心·····	景海峰(182)
熊十力与怀海德的机体论哲学·····	[澳大利亚]姜允明(210)
论马一浮提倡判教与比较儒释道·····	[香港]王 煜(227)
当代新儒家与京都学派：牟宗三与久松真一论觉悟····· ·····	[香港]吴汝钧(264)
当代新儒学与后现代理论·····	[香港]李瑞全(286)
弥勒信仰在中国·····	方立天(307)

自我、死亡与道德的生活·····	赵东明(332)
论岭南文化的潜质与优势·····	陈乃刚(354)
百越族与百越文化圈·····	刘汉东(369)
《红楼》禅·····	章必功(391)
意识形态与故事叙述·····	林 岗(402)
亚理士多德:目的论的悲剧美学理论	
——《诗学》新论·····	吕新雨(416)

附录

第一辑(目录)

论文化与传播(代发刊词)·····	蔡德麟(1)
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现代的重建·····	[香港]刘述先(1)
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袁伟时(35)
二十世纪的儒家传人·····	黄克剑(53)
饴餗餗餗·····	季羨林(105)
“條贯主”考·····	黄时鉴(115)
鉴真、圆仁与扬州·····	吴廷璆 郑彭年(121)
九华山金地藏考略·····	臧维熙(134)
妈祖崇拜与中外文化交流·····	郁龙余(152)
郑和海外用兵略论·····	谢 方(163)
俳谐·俳句·汉俳与文化传播·····	孟昭毅(179)
儒家与耶教的天人关系·····	[台湾]蔡仁厚(196)
孔耶之“爱”·····	杨 适(216)
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	[美]D·霍尔 安乐哲(234)
张载与康德的道德至善理想追求·····	陈俊氏(263)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陈 醉(276)
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两重性·····	李锦全(300)
中国古代宗教与其社会作用·····	牟钟鉴(311)
周代礼乐文化的伦理精神与美学精神·····	吴予敏(329)
围棋的哲学内涵·····	章必功(355)
《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英文版序·····	刘文英(375)

论《楚辞》对我国古代南北文化融合的贡献·····	韩湖初(380)
原侠及其侠义精神·····	徐斯年(380)
小山重叠金明灭·····	杲如(411)
《纲川集》集成之探析·····	[日]内田诚一(428)
清代民族文化交融的蒙古族诗人法式善·····	魏中林(451)

第二辑(目录)

· 传播学与中国文化 ·

论探索

——回到历史,回到中国·····	[香港]余也鲁(1)
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	吴予敏(11)
论西北民族文化传播的特征与机制·····	戴元光(22)
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予敏(44)

· 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 ·

新儒学经济思想的开拓·····	[台湾]林国雄(66)
儒家伦理与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	赵吉惠(108)
试析儒家伦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负功能	
——兼析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	崔永东(124)
儒家管理哲学及其现代转化·····	黎红雷(148)
律历与《易经》·····	[泰国]郑彝元(161)
孔子思想新论·····	王中江(167)
儒学的探索与人文世界构成的层次问题·····	[美]成中英(178)
略论禅宗佛学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论·····	许抗生(194)
陈简斋与佛教·····	[香港]王煜(204)
泰州后学罗汝芳的“赤子良心”·····	张学智(223)

略论中国近现代佛学发展的精神方向·····	景海峰(241)
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	方映灵(253)
冯友兰新理学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局限刍议·····	段德智(286)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必要张力	
——评《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	李维武(302)
试探一个贯通中西文化的世界观：阴阳辩证一元论	
·····[美]窦宗仪(310)	
自我克服与道德：尼采和儒家思想中人的创造性	
·····[美]唐力权 赵东明译(338)	
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及外来语的汉译·····	刘英凯(350)
从《恋爱中的女人》看劳伦斯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阮 炜(375)
士人文学与仙人文学	
——中印文学比较之一·····	郁龙余(406)
《文赋》门径·····	陈志明(420)
文、道的合一与分离	
——明清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变迁·····	林 岗(437)
在孩子与世界之间	
——近年文学述描之一·····	张志忠(468)

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

[美]杜维明

维明案：有关“文化中国”的英文论说是我在1990年10月24日由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一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的。〈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Cultural China: Periphery as the Center)的英文节本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学术刊物Daedalus (1991年春季号)发表以来，在英语世界引起很大的回应。《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柏克莱东亚研究中心，和以哈佛大学华裔同仁为主的《康桥新语》都集中讨论过这一议题。新加坡的国家广播电视局并参考其构想制作了海外华人的序列报道。英文全文已收入由我主编、即将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论文集，The Living Tree: 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长青树：做中国人的当今意义)。〈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的中译由刘晔仪执笔，林同奇和周勤校阅，一并在此致谢。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大学》^①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绵延最长的文明之一，“俨然一条浩浩的长河。”^②中国文化一词，泛指象征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成就上的兴衰起伏。近几十年来，此词历经各种主要的诠释阶段，当前正进入一批判性反省的新时期。作为中国人究竟含义如何，是和中国作为一地理政治概念，和中国文化作为一活生生的实体密切相关。

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20世纪是作为摧毁与暴力的形象留在集体经验中的，当我们进入世纪末的反思时，这个形象更是鲜明突出，怵目惊心。安定往往只意指几年的岌岌可危的平衡状态；甚至10年的和平相处也唤起人们对永恒的回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起伏不定的政局在史无前例的外患困扰下，过去几十年中每况愈下，不仅竞争的双方人物，甚至竞争的规则都不断在改变。例如，自1911年清朝灭亡后80年来，中国历届政府都起草并公布了一系列不同的宪法，每一部新宪法不是仅仅修正或改订前本宪法，而是全盘取而代之。^③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形式上似乎持续存在，但实质和根本上都曾不断重新改组。然而，祸害最大的断裂则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断层。

中国虽从未遭到印度那样全面的殖民统治，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损伤了其精神生命和开发本土固有象征资源的能力。中国知识分子被剥夺的，比任何时期的印度知识分子都多得多。尽管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长达两个世纪，印度知识分子从未中断向其精神生活的泉源汲取所需，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却将中国知识分子逐出儒家的避风港。两千年来，儒家社会曾为他们的先辈提

供一个安全而尊贵的泊舟处，如今他们却漂泊无寄，拼命想在权势——或加上财富——所界定的残酷的新世界里觅得安身立命之所。无能、挫折与羞辱之感，被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反偶像崇拜主义的奇特结合所不断激励，形成了他们寻求自我认同的背景，他们不仅要寻求做中国人，而且要作为在这日益异化的世界里不断思考、反省的中国人。

一、问 题

在孔子出生(公元前551年)前约500年的“轴心时代”，“中国性”(Chineseness)这个问题首次浮现时，即带来了地理政治和文化这两个层面。中国的疆域从古到今虽有显著开拓，但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却始终坚定认为文化起初停留在黄河支流渭水流域一带，后来又扩展到部分的长江流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假思索知道中原何所指：他们也许不确知中原的边缘何在，但他们确知中国的中心——无论西安或北京——在黄河附近的北方。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对中国自渭水流域如光源向四方放射一样向外扩展的论点提出重大质疑。即使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好几个中心在今日的中国领土上扩展。“中央之国”的诞生是好几个发展水平相当的文化区域的联盟，而不是由单一核心不断扩展而形成的。^④但是，尽管这种对中国文明之源起的学术性解说令人信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乃由一个可明确界定的核心经过长时期演化逐渐成形的看法，依旧根深蒂固。

如果说这假设的核心有助于一种特有的中国人认同的形成，那么，中国文化作为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就使作为中国人的意识更加显著。中国文化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生命型态，与蔑称为蛮夷的生活方式有根本差异。“华”或“华夏”一词，即带有文化和文明的涵义。居住在中原的人受文化和文明的熏陶，与众不同，和那

些居于外缘，还得学习衣食住行礼节的蛮夷显然有别。表面上，传统的夷夏之别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原的农业社会和草原的游牧部落。^⑤但中国人文化意识的兴起是以通过民族、地域、语言和伦理宗教所界定的某些原初纽带为前提的。虽然在界定中国性时，文化——而非种族——起显突作用，但受文化和文明熏陶的中国人，正如其神话所言，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的确，“黄帝子孙”^⑥的象征在中国文学里一再出现，唤起种族的骄傲。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录文献最浩瀚的文明，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更进一步强化了地理政治和文化所界定的中国性的概念。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的编年史就几乎不曾中断过。汉学家根据考古的发现和青铜器的铭文，已能确定公元前11世纪周灭殷商的日期；^⑦而目前对孔子生日的争论，只有两日之差（公元前551年9月26日或28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足使他们谈起杜甫（712——770）的诗，司马迁（约卒于公元前85年）的《史记》或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时，所谈的其实是一个藉中国方块字保存下来的岁月累积的传统，这种文字不受语音变迁的影响。透过这些表意符号接触杜甫、司马迁或孔子，给人一种真实的感受，好像他们就永远活在字里行间。无论这种历史延续感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中国人仍以汉（公元前206年初——公元后220年）唐（618年—907年）之昌明，作为衡量当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实际标准。

中央之国的病症和情结^⑧在历史上曾经使中国的上层在心理上难以割舍居于中心的优越感，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国际家庭中平等相待。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之前，从未遭受过任何水平相当——若非更高——的外来文明的全面挑战。“佛教征服中国”^⑨引发了600多年的印度精神信仰在中国由引进、驯化、成熟、发展，终成为中国独有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所奉持的高度中国化的佛教教义。^⑩过去1000年来，

女真、契丹、蒙古和满清挟武力入主中原，但就文化的角度观之，金、辽、元和清汉化成为正统的中国王朝，未尝不是补偿。中国作为地理政治上的实体，在这些“征服”后依旧存活下来，而中国文化也继续滋长茁壮。尽管如此，我们若认真考虑“浩浩长河”的意象，就得承认这些外来的巨大影响，使长河在不同的地点有所改道。“长河奔驰，新注入的水力可能顺流而下，大致原封不变；可能逸出成为小漩涡和岸边的水塘；可能与原有的潮流相激荡而产生新的潮流；也可能被流入长河下游的更新的潮流所吞噬。”^⑪因此中国，或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永远是动态的、不断改变中的景观。

但在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里，西风东渐，所起的“非中心化”作用更加明显，好像佛教的征服和蒙古的入侵被加在一起压缩成短短的一代。因此不难理解这股西潮已经彻底摧毁“中国历史的模式”，^⑫并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根本上重新界定自己面临的整个问题性。地理政治上的中国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所经历的苦难和动乱已有较完善的记录，^⑬但中国文化所掀起的勃勃生机最后引发了五四运动（1919）一代及以后数代知识分子同时鼓吹反偶像崇拜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吊诡而有趣的现象，其中意蕴迷离难解，致使研究现代思想的至今仍在摸索一个适当的诠释模式以深入探讨。^⑭

这种五四遗留的两歧心态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后，近年来有些人提倡通过西化以全面现代化。这套论调表面上很简单：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新改革时代的门户开放政策时，既已充分承认中国的落后深深植根于中国政体、社会和文化之中，中国性的彻底改造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就策略而言，达成彻底改变最痛苦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来现代西方各种涵蕴丰富而模棱两可的理念，将中国心态“非中心化”。这一厢情愿的思想

——即透过自愿而刻意地面对不同的“他者”以求得自我解放——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反主流文化的力量，既打击僵化了的现实教条，也打击儒家传统塑造起来至今仍有活力的所谓“心灵的积习”。^⑮

《河殇》这部引人争议、诠释性的6集电视连续剧，以中国文化的根源和心态为主题，直截了当地主张拥抱蓝海洋是拯救“黄土地”的唯一方法。^⑯《河殇》在1988年两度播出，在传统、现代、改革、中国、西方等问题上，引发了全国性的激烈辩论。^⑰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到工人、士兵和农民，从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大都会，到罕见人烟的西北大地，可能有好几千万人领略到剧中传达的主要讯息：国民平均收入甚至不如西非某些国家的中国，即将被摒弃于国际竞技场之外。^⑱知识分子震惊于《河殇》所提问题的尖锐性：“中国何去何从？”他们中的不少人站在激进的西化分子一边，同意改革需要勇气引进验证过的成功模式，以彻底重构中国。一些象征先人故土的神圣形象遭到诋毁：象征中国人祖先的龙，被诬为过时的帝王权威主义；^⑲象征历史延续性的万里长城，被诋毁为封闭性的保守主义的表现；而从来被视为中国文明摇篮的黄河，则被蔑指为肆虐无辜人民的恶兽。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河殇》的言外之意在向政府提出警告，或更正确地说，提出直率的挑战：加速改革，否则……！中国性在此严厉攻击下富有讽刺意义地变成少数独断专行、保守而残酷的统治者运作手法的同义字。

《河殇》传达的貌似矛盾的主旨令人想起五四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反偶像崇拜主义（反传统主义）的纠结。^⑳这一点又无可避免地挑起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中国境内的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厌弃中国文化，他们能够以全心致力于全盘西化来界定自己的中国性吗？如果他们对中国事物的诋毁是全盘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自愿放弃在中国性的

定义里占有一席之地权利?中国境内的知识分子对过去或蓄意贬人褪色的记忆或被迫加以排斥或遗忘,对现在则愤怒地抨击,而未来由于他们委身与外来的未知事物势必变得捉摸不定,他们能在此三者之间的朦胧地带中寻得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吗?这些问题似乎只关联到一小群人——那些善于表达自己并能自我反思的知识分子——但这场辩论所激起的强烈情绪却影响了一般民众。

二、挑 战

日本和所谓“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崛起^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性经济成长最旺盛的区域,使人对现代性中的传统和以不同文化形式表现的现代化过程,提出挑战性的质问:是否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甚至最好——先对传统中国文化作全面破坏性的攻击,并继之以全盘西化?就经济结构而言,这种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以与西欧古典资本主义相对的新资本主义,是否象征着一个新时代——太平洋缘区的时代?^②或者这只是个次现象,可用现存的欧美发展模式来解释?就政治而言,我们眼前是否正呈现一个民主化过程,它更多地以成为共识而非以敌对关系为基础,从而赋予参与性民主的观念以某种新的意义?或者,这只是少数精英分子打着多数统治的旗号,继续实施其权威主义的统治?^③就社会而言,家庭凝聚力强,犯罪率低,重视教育和储蓄率高,这些与其他工业社会相比,是否显示一种与个人主义式的“心灵积习”不同的情操?^④或者,这些只是现代化的早期现象,最后终将走上西方所经历的失序疏离?就文化而言这些社会是否象征着高度科技与古老礼仪结合的成功实例?或者只是传统社会消逝的过渡现象?^⑤简言之,东亚的崛起,向我们对经济成长、政治发展、社会转化和文化变迁的根深蒂固

的概念，提出了哪些挑战？

这些问题对我们诠释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十分重要；它们对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挑战性，他们认为中国性与纯以科学与民主界定的现代化过程相抵触。如果说“汉字世界”^⑤或“后儒家”^⑦地区的确成功地采取一种确然是现代而又明显为东亚式——从而也意味着中国式——的生命型态，那么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就站不住脚而必须摒弃，既不适用于高度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也不适用于分析开发中国家。因此试图以线型发展的尺度去衡量现代化，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早从70年代初期以来^⑧文化方面比较精密的现代化理论家就一再提出这个论点，但由事实验证的实例的出现应可对此作出结论。^⑨

由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传统特质——种族性、母语、祖籍、性别、阶级和宗教信仰——似乎对各种社会，无论是现代化或开发中社会——的“生活世界”都有关联，那么尽管今天全球意识到处弥漫，寻根冲动在世界各地依然强烈。^⑩如果资本的形成还有另一条途径可行，那么民主、科技、甚至现代化都很可能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出现。一些能说善道的五四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最极端的反偶像崇拜主义言论——即中国文化，不仅是儒家传统，甚至表意文字本身，都必须先废除，中国才能现代化——如今已被认为完全过时了。甚至北京和上海最热衷西化的人士，也选择在用中国文字印刷的中国期刊上传播他们的理念。对居住在工业东亚的华人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到积极参与一个彻底现代化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与作为地道的中国人并不一定相抵触，这就意味着现代化可能提高——而非削弱——中国性。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意义本身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转化。

最近一个含有长远政治和文化影响的经济现象，就是亚太地区内部诸国彼此贸易量的激增，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已超过跨太平洋的贸易量（而后者现已显著高于跨大西洋的贸易）。由于